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贵州东部高地苗族的情感与婚姻

简美玲 著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东部高地苗族的情感与婚姻 / 简美玲著.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09. 5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ISBN 978-7-81126-149-3

I. 贵… II. 简… III. ①苗族—情感—研究—贵州省
②苗族—婚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研究—贵州省
IV. K892.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8286号

贵州东部高地苗族的情感与婚姻

简美玲 著

策 划: 张三白

责任编辑: 立 道

出 版:  贵州大学出版社

发 行:  崧阳文艺书店

设计制作:  贵阳甘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荣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625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1126-149-3

定 价: 44.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 8292951

编者的话

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作多种的解读：以秦岭为界，以北为北方旱地小麦文化，以南为南方稻作文化；以瓊辉—腾冲划线，线之东为农耕文化，线之西为游牧文化；以地方特色名，又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大而划之，又可分为三种文化圈或称为文化版块：蒙藏的佛教文化圈、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圈，除此而外，所有版图均为儒家文化圈。于此编者所欲说明者，处儒家文化圈内的云贵、湘西、桂北，似乎更应该独立为“巫文化圈”。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上古之时，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立庙堂，而后独尊史官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一统天下之势，“巫”的处境每况愈下：被逐出庙堂、逐出中原，退而居于西南一隅，在土著中苟延。如此看来，西南土著中保有的巫风，恰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

2013年，贵州将迎来建省600年。昔以中原为中心的儒教文化依“五服制度”分野，贵州地处“要荒”，位列边缘。但若以“巫文化”视之，贵州却正是“巫文化圈”之中心，所谓“西南之奥区”。在中原失落了的巫文化体系，恰好在贵州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梳理，可称上符“礼失而求诸于野”的古训。

以人类学的眼光看贵州本土文化，大概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19 世纪末，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贵州就成为重要的对象研究地。从早期的传教士、西方学者，到中期的国内学者再到近期的本土学者，文化人类学在贵州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并形成了大批成果，成为了研究贵州省情和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视角。我社将用六年的时间，以每年一个专辑十本的速度，对以往的贵州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作一爬梳，选编出六个专辑共 60 册一套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以“六十名著”诠释“六百年贵州”。

作为分外之想，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成为研究贵州文化史和少数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库，如同我们的先辈文通书局曾出版的“黔南丛书”一样，我们期以此套出版物能够推动地方文化史和贵州的“原生”精神文明的研究，甚至促成“贵州学”和“贵州学派”的诞生。

2008 年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其主题是苗学。因为苗族是贵州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也是有史可稽的与华夏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多民族中的一员。为完整地体现贵州苗学的不同阶段最重要成果，我们有选择地重印了部分名著，翻译了国外研究苗族的部分重要著作，也采用了我国学者的部分优秀苗学研究的新作。

出版前言

苗族，就其人口数量言，是中国第五大民族，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苗族有 894 万人。苗族同时又是一个分布世界的民族：在东南亚各国的苗族有 200 多万人，美国有 30 万人，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共有 5 万人。苗族还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距今五六千年前，苗族先祖蚩尤就同华夏族领袖黄帝、炎帝逐鹿中原并称为中华文明三祖。千百年来，苗族因战乱所迫，迁徙无恒，最终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才找到生存之地。现今贵州的苗族有 400 多万人，约占全国苗族人口的一半。贵州是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苗族也是贵州除汉族外人口最多的民族。

研究苗族和苗族文化的学问叫“苗学”，古代贵州的“苗学”文字，大多来源于地方官员，如李宗昉的《黔记》、爱必达的《黔南识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田雯的《黔书》、胡宗绪的《苗疆记事》、龚柴的《苗民考》、贝青乔的《苗俗记》、徐家干的《苗疆闻见录》等。最大规模的“民族调查”有清代组织的《百苗图》编绘。但上述著述大多立场偏颇，观念“正统”，又只是为“王政”或“战事”服务，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的“学（-ology）”。

运用现代学科方法而发轫的“贵州苗学”著作，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和早期人类学家，如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萨维那所著的

《苗族史》，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等人大量的调查报告，还有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这些著作大多产生于19世纪最后十几年至20世纪最初的20年，可以将它们看作是“贵州苗学”形成的初期阶段。换句话说，“贵州苗学”研究始于西风东渐。这使得“贵州苗学”研究从一开始，便具有“国际”的视野。之后出现的《贵州苗族考》（1929，杨万选著）可以看作是贵州苗学研究初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

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为抗日战争，大批大学教授和学者内迁贵州，从而促成贵州苗学研究的高潮。这一期间，贵州苗学研究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水平学者带领下的有组织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活动；二是苗族群体中出现的学者提供了“自述”的视角与研究。当年，闻一多等名教授带领的西南联大学生在贵州境内的采风；大夏大学成立了由名教授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徽等领衔的“大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编辑了有关贵州少数民族方面的专门刊物：《大夏大学民族学论文集》、《苗夷研究丛刊》，出版发行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新谣》、《贵州苗族概论》等著作。这一时期，苗族学者已初露锋芒，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梁聚五氏，其著有《苗夷民族发展史》；若杨汉先氏，则著有《大花苗迁入乌撒考》等；王建明氏，撰有《西南苗民的社会形态》等文；王建光氏，撰有《苗民的文字》等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至60年代，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和民族教育院校。我国的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也为配合民族自治、民族识别等工作，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为贵州苗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期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编印了《苗族社会历史调查》，编写了《苗族简史简志》；各民族自治的地方也编写了相关概况。大量调查中的“采风”作品也都收入《民间文学资料》得以编印流通。这一阶段，贵州苗学研究最大特色是“政府行为”——由政府组织得以实施。

“文革”期间，贵州苗学研究和其他任何社会科学一样，沦为空白。

虽然，此期仍不乏罕见成果，如台江农民王安江为搜集苗族古歌的艰苦努力——他从1968年开始，行乞为命，周游各地，徒步跋涉数万里，收集整理了完整的《苗族古歌》，至今仍然是值得为之赞叹的壮举。

改革开放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在“文革”造成的十年空白之后，民族文化的研究与重建取得了丰硕成果，贵州苗学研究也成果斐然。这期间，主要的苗学研究著作有：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杨庭硕的《百苗图研究》，翁家烈的《苗族文化论》，麻勇斌的《神性妇女研究》，杨培德的《鼓魂》，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罗庭华、余岛的《贵州苗族文化教育研究》，徐新建的《苗疆考察记》，石朝江的《中国苗学》等。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来自苗族内外，也来自海内外。相关的涉及苗族的研究，在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的各种视角下，更是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进入21世纪以后，除了继续发展和繁荣的势头，苗学研究进入到“整合”阶段，有了大部头的《苗族通史》的面世，《20世纪苗学研究百部文库》首次出版第一辑便有10部；时间跨度近百年的《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也由英、苗、汉学者共同完成；首部集可视、可听、可读的《王安江版苗族古歌》也由本社出版。贵州苗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本丛书第一辑将目光集中在过去百余年来贵州苗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努力保留各个时期的阶段性代表作品。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重要著作之一，萨维纳所著的《苗族史》一直未能译成中文，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我们从国家图书馆找出原书并组织了翻译；曾被称为“苗族救星”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写过《苗族纪实》，另一英国传教士克拉克著有《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此二书现合并刊行；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在1936年曾经刊行，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代表作品此次亦作再版。

19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末，是苗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

此期间我国重要民族学者的著作中，我们选了杨万选著的《贵州苗族考》（1929）与吴泽霖、陈国钧、杨汉先等人的文章合为一册；苗族学者梁聚五著的《苗夷民族发展史》则更名为《苗族发展史》独立成册。

50年代至60年代，因贵州民族出版社曾出有大量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我们仅选载了著名学者费孝通“劳动的苗家”与中央民族调查团的一份调查报告和调查资料合为一册，用以反映当时的调查观点和调查方法。

80至90年代，是改革开放后苗学研究恢复发展的时期。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和石朝江的《中国苗学》，也是此时期成果丰硕的苗学研究的代表。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外苗学研究日趋繁荣。考虑到苗学研究的这一现状，我们选择了美国学者路易莎和台湾学者简美玲的新著，以期读者能够了解海外贵州苗学研究的趋势和前列学者的成果。

区区十册，难免挂一漏万，还望贵州苗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原宥。作为贵州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部分和成果最多的部分，“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刊行的是“苗学研究”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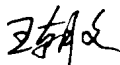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贵州苗学研究各个时期的特征和认识水平，除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谓作了删改外，尽可能保留原著原貌。另外，有些文章的著作权人一时未能联系上，为其大作早日出版，泽惠学林，不得已只好先行采用。我们恳请原作者或著作权继承者海涵原谅，并请与本社联系。

出版者

序

贵州是苗族聚居的大本营，贵州也应该是苗族研究的大本营。18 世纪下半叶以来，贵州苗学从“潜流”（未有苗学研究之名但已有苗学研究的著作）变为“洪流”（20 世纪 80 年代为“苗学”立名并产生大量研究成果），也与“藏学”一样正在成为一门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显学”。不管怎么说，贵州苗学从来就是贵州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研究的主流。

贵州有许多优秀的苗族学者和苗学研究著作，也有许多优秀的国际学者研究贵州苗学。这是贵州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贵州文化建设的一笔重要财富。贵州大学出版社将贵州苗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和贵州苗学重要著作的集成放在其向贵州建省 600 周年献礼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出版，感到可喜可贺。出版社同志嘱我作序，千言万语无从下笔，写下几句感言，是为序。



（原贵州省省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苗族）

按：简美玲，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人类学博士，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副教授，从 1997 年开始研究贵州苗族的亲属、语言、婚姻与情感，曾长期在黔东南台江县苗寨作田野调查，《贵州东部高地苗族的情感与婚姻》是她这段工作的主要成果。

摘要

贵州东部高地苗族社会并行以表述（两性）结伴情感为主的游方、情歌与交表婚。在部分苗族地区，此一特点无论从1950年以前延续至1990年以后，依旧是苗族村寨社会的理想与实际。基于明清以降有关中国国家周边族群的地方志、史料等文献基础，与我于1998—2000年在黔东南台江县的高地苗族村寨所搜集的民族志田野材料所展现的特性，这本专书将由重视情感的角度来描述、探讨高地苗族以（两性）结伴为主的情感与交表联姻的内容，以及此二者所展现的情感与联姻结构的暧昧。

在苗学与人类学的研究上，这本专书展现以下两层面的意义：其一，对于西南中国苗族研究而言，本书的意义在于，过去对于苗族婚姻富情感特性的描述或讨论，通常未脱离以汉族为中心的批评观点，因此对于能展现苗族文化价值的情感与婚姻，还有相当空间值得描述与讨论。我以为，情感的探讨可能是了解高地苗族如何作为其文化主体的新方向；其次，就人类学的情感与文化研究而言，这部作品一则经由苗族（两性）结伴的情感内容，衔接人类学对浪漫情感的讨论，并在村落民族志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游方、婚后双居制的坐家与私奔婚，叙述苗族社会里的情感与婚姻、亲属结构之间的关联与暧昧，并由此探讨个人之人性与能动性在面对与社会之集体理想或整体价值冲撞时所感受的张力。

本书的第一章描述游方作为苗族村寨浪漫情感天地里的社会性

与个人性。我将经由时、空、人三个层面，说明“年轻人”情感天地所展现的专属、边缘与全社会价值，以及相伴的个人情感内容。第二章描述歌与情感。高地苗族村寨的情歌以两类结伴的交错并置，与两颗心的情感内涵，表达他们对于情感与婚姻的戏谑。相对于前二章谈的是“年轻人”的情感天地与歌，接下的三、四、五章的主题，则转至高地苗族村寨的婚礼（物）交换、称谓体系之结构与实践，以及联姻的理想与实际。第三章以婚礼交换的仪礼物，来表述男家与女家之缔结的策略。在新娘的工作、姊妹伴，以及坐家期间的禁忌与礼物往来，村寨苗族社会呈显其对社会界线之区辨，与模糊的结群伦理。第四章描述亲属称谓与结群理想。在这一章我将说明在 高地苗族村寨称谓如何与婚姻是一整体的对应关系：其一，间接称谓的语意结构，展现交表婚姻的优先趋向与指定性(prescription)；其次，直接称谓的变动与说话者伴随婚姻、生育而来的社会身份变动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突显父系继嗣与生育繁衍的集体理想及价值。第五章描述、讨论高地村寨苗族如何通过多重表述的交表联姻的理想与行动，以及村寨内婚与外婚的差异与对比，建立与巩固一个理想的村寨。最后在第六章，我以不顾家与违背村寨理想的私奔婚，说明在一个以交表亲联姻为理想及实际的社会，选择私奔婚的新娘，是在私奔婚所引发的不确定及特定的暧昧，以及交表亲联姻所展现的确定与整体之暧昧，做了权衡。

经由前述六章的民族志书写，我在这部作品想阐述的就是高地村寨苗族如何为情感开辟特定的空间、时间，以及物的交换，并且情感对于他们生活的意义，不仅展现在个人的层面，也有集体的层面。通过游方、婚姻的交流、婚后双居的坐家习俗与仪礼物的连结关系，村寨苗族同时表达出为结群所采取的婚姻策略，以及婚姻与个人情感不必然为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最后再经由情歌的戏谑，以及父母送出门的公开婚与私奔婚的并行，我们可以归结出一个重点：至少自十九世纪以来，高地村寨苗族习以交表婚为其结群策略的社会历程里，个人的与集体的情感与情绪有其不可忽略的位置。

致谢辞

谢谢贵州大学与贵州大学出版社促成本书作为贵州人类学研究系列的专书之一，以及在这次的修改中，范思颖与陈靖旻尽心协助图文的校对工作。这本书的原稿是我在 2002 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的完成是一条漫长的路。感谢多位老师与朋友，在不同的阶段，陪我一路走来与协助。首先，我要感谢 Fangf Bil 村寨的朋友，尤其是照顾我一年多，让我与他们生活起居一起的唐叔、唐婶、妹妹与弟弟。难忘在严寒的冬天，唐婶为我准备红跳跳的炭火，使我能在寒冬里，不分白天、夜晚，在温暖的山寨木屋内，书写田野笔记，听写、翻译访问的录音带及苗歌的文本。特别感谢妹妹 Ghaif Wangk, 以姊妹相待，接纳这个仿佛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台湾姊姊。除了住宿的唐家，我还要感谢村寨的其它长辈、朋友，您们朴实的外表，温暖诚挚的笑脸，如同您们愿意让我分享的生活经验、智慧与理想，令我难忘——不只是学术，也是心灵上的。感谢台江县城、贵阳省城的长辈与好朋友：明达伯伯、运荣伯母、少华兄、杨兰、业强大哥、张晓、寒梅，以及创作苗歌的春芳爷爷。与您们在一起，使我总有回到家的温暖。来不及在此列出的，还有许多朋友与长辈，感谢您们。也谢谢贵州民族学院庾修明教授、金处长、李锦平教授、王涟女士提供协助，使我能在黔东南进行相对长期的博士论文民族志田野研究。贵州省台湾办事处吕东处长，感谢您在我遇到困难时，替我打开难关，平稳我的心情，使

研究工作得以持续下去。谢谢前贵州民族学院杨庭硕教授，您对贵州民族学与历史学研究的成果，以及您为学的精神，给到贵州的我，深刻的启发。

从论文的构想到田野的执行，以及最后的书写，我要特别感谢两位指导老师李亦园教授与何翠萍教授。谢谢您俩长期的鼓励与支持。尤其在论文书写的最后阶段，与两位老师的互动，使我深刻感受书写与学术创作间奥妙的关联，以及极大开展的可能性。感谢清华大学人类所魏捷兹（James R. Wilkerson）教授多年来，细心、无间断地引导我对亲属研究的兴趣。感谢为我审查论文初稿及举办口试的东华大学族群关系研究所乔健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胡台丽教授、美国卡内基美隆大学历史系苏堂栋（Donald Sutton）教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王明珂教授。你们的意见，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能以更宽广的角度，来面对自己的作品以及研究。

在清华博士班五年半的时间，感谢许多老师与同学，在不同阶段的相互做伴。到西南中国做研究，是学术的锻炼，也是生命中极大浓缩下的历练。很高兴我们也有一群伙伴，不只是清华、台湾，还有中国大陆与海外的人类学家。你们的“在”，是我完成整个论文及学业过程中，很重要的支持力量。

博士论文的执行及完成的过程中，先后获得多项奖助。感谢陆委会中华发展基金会提供“研究生赴中国大陆地区研究奖助”，（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主题计划“亚洲季风高地与低地社会文化”提供研究经费补助，使我得以在1998年11月至2000年2月，顺利到贵州省东部进行田野工作。论文书写期间，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人文科学博士候选人培育计划”提供论文写作的奖助（2000年7月至2001年6月）。

最后，想将心里的谢意献给家人。谢谢祖母、父亲、母亲、弟弟锡宏与志宏，对我永远的支持。感谢公公、婆婆，给我宽广的空间学习、成长，担代所有媳妇应该对家的责任。也要谢谢两个如今

已渐渐长成青年的小兄弟，伯安与仲宁。他们的妈妈，是一个在他们还懵懵懂懂的年纪，去到他们很陌生的地方，住很久的妈妈。还有，谢谢希恒，总是任我筑梦。

并不想修改 2002 年的致谢辞，虽然亲爱的祖母、贵州的明达伯伯与春芳爷爷，三位疼爱我的长辈，于近年的往生，提醒我这段文字，在时间的流动里。

苗文（黔东南方言）声韵调表与国际音标 （IPA）对照表

本文所使用的是黔东南方言的苗文声韵调系统（张永祥等，1989）。这套语音系统所包括的声韵调范围最宽，我实际进行田野调查的 Fangf Bil 寨子的地方语音系统，全部可以被含括在其中。苗文的语构为：C+V+tone → 声母 + 韵母 + 声调。

声母：苗文（相应的 IPA）

b (p); p (p'); m (m); hm (m'); f (f); hf (f'); w (v);
d (t); n (n); hn (n'); dl (t'); hl (t'); l (l); z (ts);
c (ts'); s (s); hs (s'); r (z); j (tɕ); q (tɕ'); x (ɕ);
hx (ɕ'); y (ʐ); g (k); k (k'); ng (ŋ); v (ʏ); hv (x'); gh (q);
kh (q'); h (h)

韵母：苗文（相应的 IPA）

i (i); e (əu); a (a); o (o); u (u); ai (ɛ); ee (e);
ao (ao); ei (ei); en (en); ang (aŋ); ong (oŋ); ia (ia);
io (io); iu (iu); ie (iə); iee (ie); iao (iao); in (ien);
iang (iaŋ); iong (ioŋ); ui (uei); ua (ua); uai (ue);
un (uen); uang (uaŋ)